

冰心

life
人生文丛

有了爱就有了
了一切

宁

静

人

生

●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人生文丛

冰心

宁

静

人

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文丛：冰心/宗豪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5

ISBN 7-104-01277-X

I.人… II.宗…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412 号

人生文丛

冰 心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广东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1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4 印张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104-01277-X/1.511 全三册定价:45.00 元

本册:15.00 元

目 录

·冰心自传·

冰心自传·····	(3)
我的故乡·····	(6)
我的童年·····	(14)
我的父母之乡·····	(24)
我的大学生涯·····	(27)
在美留学的三年·····	(36)
我从来没觉得老·····	(42)
我入了贝满中斋·····	(44)
童年杂忆·····	(51)
回忆“五四”·····	(59)

·冰心谈女人·

《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65)
我的择偶条件·····	(67)
我的母亲·····	(70)
我的奶娘·····	(75)
我的朋友的大太太·····	(80)
我的房东·····	(85)
张嫂·····	(95)
我的朋友母亲·····	(100)

给日本的女性 (109)

·往事·

往事（一） (115)
往事（二） (133)
画——诗 (158)
笑 (160)
我 + 基督 = ? (162)
南归 (164)
到青龙桥去 (190)
“除夕” (195)
梦 (197)
新年试笔 (199)
十字架的园里 (201)
五月一日 (203)
闲情 (206)
法津以外的自由 (208)
无家乐 (210)
胰皂泡 (214)

·三寄小读者·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219)
寄小读者（节选） (221)
再寄小读者（节选） (231)
三寄小读者（节选） (244)

冰
心
自
传

冰心自传

我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阴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1901年移居上海。父亲是当时清政府的海军军官，那时担任副舰长。

1904年，父亲任清政府海军练营营长，后来又任海军学校校长，我随父亲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过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村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中华民国成立，我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1913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1914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1918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的是理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拿到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

1923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1926年我读完研究院回国，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21年后，文学研究会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1926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我先到了昆明，1940年又到重庆，因为生活需要，我又不愿用冰心的名字写文章，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到了日本。1949年至1950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东京大学校刊上。

1951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灯》等。

1958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1954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

除了创作之外，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和他的短篇小说，穆·拉·安纳德的《印度

童话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尔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

我的作品曾由外国翻译家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出版。

1980年6月

(选自《冰心研究资料》)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父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他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衣，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漂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

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于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弟”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

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来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讲的就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金山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的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的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才子）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

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幅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幅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羈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幅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又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又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军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至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在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了！”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替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

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